

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 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朱 传 荣

列宁说：“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英明地迈进的”光辉里程碑。它是马克思毕生中最重要的科学巨著，它集中了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最卓越的成就。它不只是一部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宝库。《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论的科学体系的建立，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特别是在《资本论》中成功地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其在认识中的巨大作用。认真学习研究《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及其应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无疑对于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重大问题，对于全面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有极大意义的。

一、《资本论》中对形而上学方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

《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伟大成果，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和彻底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科学结晶。马克思在当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②采用什么方法对待政治经济学这门历史科学的问题，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当时存在着两种方法，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即那种传统的、平庸的、缺乏联系的、自相矛盾的、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力求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源，而是着重做已知的前提，它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暂时的历史形式，而是说成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批判穆勒时写道：“在经济关系——因而表示经济关系的范畴——包含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③否认对立面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是形而上学方法的本质特征；坚持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它比前一种方法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它提

供了有巨大历史感的思维方式，它是力求揭示、研究和证明历史是按照自身的必然性永恒的发展着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辩证历史观不仅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理论前提，同时也为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逻辑方法的出发点。但是在其现有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要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能够对经济材料进行逻辑加工的科学方法，就必须予唯物主义的改造。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第一次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接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都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神秘性。但由于历史任务的局限，没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意义、特别是对他的逻辑学做到充分理解，所以在批判其思辨性和神秘性的过程中往往作了不少的限制和否定。而在1857—1867年间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时，却做到了这一点。当时，马克思根据系统科学的要求把他多年收集和积累起来的无比丰富的经验材料进行逻辑概括，使经验材料变成严整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他重新发展和评价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意义，尤其是在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巨大意义。当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给了高度评价。1858年1月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番，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展，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④十年以后，他又重申了这个意愿。⑤事实上，只有马克思才能够担当起彻底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任务。恩格斯说：“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⑥《资本论》的问世，就标志着这一任务的最终完成。所以说，《资本论》的出版，既说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始告完成，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改造所获得的最大成就。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本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⑦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性质上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对立，是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形式，它在本质上是为现存事物作辩护的，所以它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形式，是无产阶级认识现实和变革现实的理论武器。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

二、《资本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⑩采用唯物辩证法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以及指明克服这种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是《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揭露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呢？仅就第一卷的基本内容对此问题作简略的说明。

第一，矛盾分析法是《资本论》辩证法的根本特征。运用矛盾分析法首先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因为商品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的起点，又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必须由商品开始。马克思从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流通中，分析出商品这个统一物的内在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然后对这两个方面逐一分析，以便从它们的矛盾统一中揭示出商品的本质。商品之所以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⑪即商品是具有二重性的。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是特殊的物质属性，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不同，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或消费中才得以实现。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者不是为了使用或消费而生产，是为了交换去生产的。这样就使商品物的使用性和用于交换的作用永远处于矛盾对立中，这种对立就直接揭示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对立。所以说，仅就使用价值方面考察，还不能说明生产物是商品；只有从交换价值方面去分析，才能揭示出生产物的商品本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商品交换的分析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⑫马克思在揭示出商品的二重性之后，接着就揭露分析了商品二重性的根源，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是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法的重要特点，马克思认为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他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⑬第一，由于对劳动二重性的论证，就科学地阐明了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成为真正的科学学说。恩格斯说：“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⑭其次，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和论证，是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揭示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才能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示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根源。这个矛盾不断发展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此可见，《资本论》中矛盾分析的根本内容，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第二，在《资本论》中，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本质，即价值增殖，必须采用质和量矛盾统一的方法分析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只有做了这种分析之后，才能科学地把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区分清楚，才能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别开来。如果说，我们在第一点里，主要是说明《资本论》应用矛盾分析法揭示了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内容，即作为“资本起点”的商品与货币的性质，阐明了劳动价值说的基本原理。那么对第一卷的第二部分的内容运用质和量矛盾统一的方法就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揭露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有用物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质的方面看使用价值，每个商品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效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⑮因为物的多种属性和多种用途，是随着人类的文化、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而逐步被人们所发现、所利用。比如煤、石油起初只知道可作燃料，后来就发现它们有多种属性的多种用途了。从量的方面看，衡量商品的尺度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因为商品的自然性质不同，衡量的尺度也就不同。如布匹计量长短，是用丈、尺来衡量，米、油计量重量，是以斤、两来衡量的。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习惯也逐步改变，衡量尺度也会改变。如过去计算长短是用市尺，计量重量是市斤，现在改为公尺、公斤。从这里就说明了，使用价值的质的多种用途和量的计量尺度，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形成的，它

的质和量是它的自然属性，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说得好，“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生产关系。”^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使用价值。

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但是这种量的关系，不是由相交换的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的，是由它们共同性的质决定的。比如说，10斤大米可以和20尺布相交换，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个东西既不是大米又不是布，而是“第三种东西”，即凝固在商品体中的抽象人类劳动——价值实体，即价值的质。由此说明每一种商品，从使用价值上看，它们都是异质的，当然不好互相比较；但从交换价值上看，它们都是同质异量的，因此可以互相比较。这个同质异量的东西，正是交换价值的内容，也就是商品的价值。价值同交换价值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那末，价值在表现中，各种不同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是怎样规定的呢？因此，对价值的考察，首先是一个质和量的辩证法问题。作为价值的质，就是凝固在商品体中的抽象人类劳动——价值实体。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测量的。马克思说：“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那末，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⑪由此可见，在考察价值的量，则只有在它还原为同一单位，还原为具有同一品质的价值实体以后，才能有量的比较。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关系，就是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注重分析商品的价值量，不分析商品的价值质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⑫这就是说，商品的一定量的比较，只能以同一单位即商品价值质的同一性为前提。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理解质和量的辩证法，不理解量的比较是以质的同一性质为前提的，所以他们就完全被吸引到价值量的分析上去了。这也是他们不能把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区别开来，不能把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区别开来的方法论根源。

第三，在《资本论》中，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是探求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出现新结果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认为，从一般商品到货币的出现，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表现。商品价值形态的矛盾运动，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一个商品之分化为商品和货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了和矛盾的解决，就是商品价值形态的完成，就是一般价值形态和货币的确立。对于这一发展的全过程来说，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简单价值形态→扩大价值形态→一般价值形态。扩大价值形态对简单价值形态的否定，是第一个否定；但是价值形态的发展又必然创造出它自身的否定，即转化为一般价值形态，实现第二个否定。也就是说，简单价值形态，必须经过扩大价值形态，才能发展成为它的完成形态，即一般价值形态。马克思说：“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即货币形式——引者注）与第三种形式的唯一区别，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唯一的进步是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⑬可见，由一般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商品价

值形态的矛盾运动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这表明马克思在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时，不只是考虑到这个规律能够帮助理解矛盾发展的具体结果；他还把否定之否定看作是矛盾运动、发展的解决形式。从而也就深刻的揭示出矛盾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在联系。在《资本论》中，矛盾分析法和否定之否定的方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事物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前进的过程。马克思从分析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分离、再结合的历史过程，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必然产生到它的必然灭亡的历史，就深刻揭示了这两个规律的内在联系。

三、为全面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努力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所做的伟大贡献同他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建树一样，已牢牢载入人类思想史册中。他所创立的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为一百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变革所证明是最先进的科学学说，是人类、特别是革命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邓小平同志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也就是说，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不能只研究建设的一般规律，还一定要研究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以及在建设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的某些特殊规律。要做到这一些，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坚定地“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是与他善于研究实际的优良学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对于我们当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的全面系统的改革，是有着极重大的指导意义，回顾我国从五十年代后半期以来，不论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还是在国民经济管理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的一些弊端，究其理论根源来说，不仅是没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缺乏辩证法，唯心主义的估量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长期统治着一些人的头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论十大关系》的理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付诸实现，是和思想理论中这种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坚持唯物辩证法所带来弊病是多方面的。例如，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去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以主观意志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代替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研究。在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时，往往片面强调新旧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忽视甚至否二者之间在经济上的因缘关系和历史联系，结果严重影响了在经济实践中对我国国情和国力的科学认识。把社会主义经济看做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实物经济，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取消价值规律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客观作用。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劳动的两重性，产品的两重性；只讲使用价值，不讲价值。结果是在生产实践中不计成本和积压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还有在农业生产中，只注意研究宣传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忽视它的经营形式的多样性的研究，片面强调集体经营，否认个体经营，习惯于大轰大嗡，反对“小自由”。结果使社会主义的农业长期上不去。又如在研究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只就分配关系研究分配，忽视对生产过程本身的深入研究。结果使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仅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反而变成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懒汉们的护身符，这种弊病从理论研究上看，就是没有把按劳动分配原则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结合起来研究是有直接关系的。以上所列诸种弊病，都充分表明我们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和经济理论研究中，没有象

马克思那样坚定地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始终。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起点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都缺乏系统地周详的研究。也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深入研究一种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而是较多的注意研究交换和分配的过程。没有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生产关系时那样，首要的是着力地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如何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出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如何资本化的。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把交换和分配作为基本的东西，那就不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不能把各种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因为在生产诸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主要的，它决定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的系统地全面的改造，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深刻研究的基础上的，因而所制定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是科学的。

其次，我们说矛盾分析法是《资本论》中辩证法的本质特征，《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矛盾分析法，也是我们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无比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则根本不存在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着矛盾了。它还存在着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存在着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然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的国家可以自觉地进行调整和克服，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协调地向前发展。因此，党中央反复告诫我们，要搞好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必须进行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的改。这是依据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提出来的。不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不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胡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的改，就是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的改。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我们必须认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②①}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如何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实现上述要求的理论保证。

第三，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有不少直接的说明和启发、指导我们思考的论述。特别是我们国家现在正进入城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大发展时期，努力学习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分析，无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疏通商品流通，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思应用质和量辩证统一的方法，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质和量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商品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对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和规定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有巨大意义。在我们工农业的生产中，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努力降低产品的成本，生产出最佳适用性的产品，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前提，提高经济效益，又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前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使剩余价值资本化。因此，资本家对于商品价值的质和量是非常关心的。特别是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如何实现出来，更是他们绞尽脑汁的事情。资本家对于商品的“适用性”和时令性是

常注意的。否则，他们就不能获经济效益。我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因此，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性问题，就是要生产出最佳适用性的产品，即生产出好产品来。生产部门要生产出适用性最强的产品，不仅是产品质量好，数量多，而且必须是产品成本低。质量、数量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互相制约的。但一般说来，质量是产品的主导方面。所谓“产量多少”，“成本高低”，都是指一定质量的产品说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一定质量的数量或成本。只有在质量上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其生产的数量才是越多越好，其成本也越来越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就会迅速发展。否则，就会是完全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质和量辩证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生动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商品价值的质和量的分析方法，如同整个《资本论》一样，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我们的现实生产和理论活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⑦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第38卷第191页。

②⑥⑧⑨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121—122、217、218、124页。

③④⑤⑩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91页，第29卷第250页，第32卷第335页，第31卷第385页，第24卷第22页。

⑫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⑬⑮⑯⑰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48、16、51—52、63、86页。

⑲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⑳ 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21日第1版。

（上接第94页）

现在把它们找出，重新发表，也算为《全集》增添一点新资料。

徐志摩的书信，目前还发现不多，因而这几封信，对于研究者来说，还是值得珍视的。徐志摩在信中说，他赏识的是“性情之真”，而最憎恶虚饰做作。虽然朋友通信，有的也难免拘束，但这些信，他却写得“顶自然，也顶自由”。难其真切自然，也就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诗人的性格，反映出他在这时期思想情绪和生活状况的一个侧面。从有的信中，还可以窥见他作诗的创作过程，这是在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的。信中的两首诗，后来收进集子时都有些改动，也可供我们比较研究。从信中，我们看到他厌弃世俗的烦扰，赞美宁静和谐的大自然，向往性灵的解脱。这些地方多少表现了诗人对充满丑恶和庸俗的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光明的追求。但是

他的理想和追求是抽象的、个人的，这又不时使他流露出感伤、空虚甚至颓废的情绪，如他自己所说，“我这常在黑地里构造意境，其实是太晦涩了”。但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他的基本情调和风格，还是轻快和清新胜于哀愁和颓丧的。信中，内心世界的真率表露，自然景物的致密描写，都显示出诗人的风格特色。

现在根据《现代文艺》重新发表六封信，以原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编上（一）至（六）的序号。除因便于排印，将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现在通用的简体字外，其余文字、标点，悉如原样，不予改动。明显笔误或排错的字，用方括号〔 〕注在后面；原报上模糊难辨或空缺之处，以○代替；有疑义或需说明的地方，则加注释。

（上接第96页）

注释：

①③ 它，原文作“牠”，疑为“她”之误。

②⑦ 此句下，应空一行。

④ 此处括号和柏字，是原有的。

⑤ ，掏原文作“掐”，显系“掐”之误。

⑥ 傻和棕，原文都是繁体，字形相似。

⑧ 此处括号有误。

⑨ 挑绿水，疑即华兹华斯之妹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之异译。